

# 近百年汉语书面语的语域演变研究\*

许家金<sup>1</sup> 李佳蕾<sup>2</sup>

(1.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人工智能与人类语言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89;

2. 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北京 100876)

**摘要:**现代汉语因时而变,或快或慢,或微观或全局。文献中不乏对现代汉语字词、句式的历时考察,然而对篇章特征的百年嬗变关注不多。本研究试以多维分析法(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探究百年间现代汉语书面语的语域(register)演变规律。研究发现,百年来现代汉语书面语语域总体呈现三大特征。(1)语篇功能明晰化,即从“叙、论共生”到“叙、论分立”。例如,1978年后的语料显示,互动性、论说性和叙事性成为相对稳定的自足功能维度;(2)交际距离趋近化。自1950年始,互动性在语篇功能维度中的位次得到突显。1978年后,互动性成为现代汉语的最重要功能维度。互动元素的增多拉近了读者与作者间的距离,使文本更加通俗易懂;(3)历史时期关联性。新文化运动、政局变迁、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背景与现代汉语语篇功能存在高度相关。本质上,现代汉语的语域演变由“古语今言”以及“化西为中”等多重因素共同促成。

**关键词:**现代汉语书面语;语篇功能;语域演变;语体语法;语料库

DOI:10.13458/j.cnki.flatt.004878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38(2022)04-0076-11

## 1. 引言

20世纪以来,现代汉语书面语(下文以“现代汉语”略称)顺时而变。“五四运动”进程中也伴随着文体革新运动,文言地位受到挑战。旧式书面语体式微,新语体逐渐浮现。现代汉语融合口语、方言、外来语和文言元素不断演进(冯胜利 2018: 152)。这种演变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新词汇和语法结构丰富了白话文表情达意的功能。新的书面语“以口语为基本,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的杂糅调和”,是“雅致的俗语文”(周作人 2011: 85)。现代汉语的另一变化是新语域的滋生。白话报刊和杂志兴起创造了新的舆论平台;五四后的演讲热潮使得“声音”落在纸面,造就大量模拟演讲的文章(陈平原 2020: 79);侦探小说的传入带来倒叙和插叙等新叙事手法(陈平原 2010: 43);为“改良群治”,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开始出现(梁启超 1902: 1)。本研究尝试在语言特征的描写层面,系统考察现代汉语的语域特征发展路径,追踪不同时期现代汉语的篇章功能演变,勾勒现代汉语语域近百年变化的历时概貌。

## 2. 现代汉语语域研究

本研究采用“语域”(register)这一术语,与文献中的“文体”“语体”和“体裁”等概念含义相近。因为本研究的核心思路参照 Biber (1988) 开创的“语域变异”(register variation) 多维

\*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语料库语言学史”(项目编号:20YYB0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许家金,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话语研究,二语习得,语言对比与翻译,语料库语言学;李佳蕾,讲师,研究方向:体裁与语域研究,语料库翻译研究。第一作者邮箱:xujiajin@bfsu.edu.cn

分析法,故而采用“语域”这一术语。另外据吕叔湘(1992: 164)的观点,因为若采用“文体”,则与“风格”接近,而采用“语体”,又难与白话文的旧称“语体文”区分。故文中除转引他人文献外,均使用“语域”这一术语。

在概念层面,语域指与特定语言使用情境相关的语言变体,包括因不同交际目的而产生的不同话语类型,属于功能性语言变体范畴(Biber & Conrad 2009: 6; Halliday 1978: 31),例如,新闻、小说、纪实文学、政府公告等。

在分析和方法层面,Halliday(1978)提出可从语场(field)、语旨(tenor)、语式(mode)三个维度以自上而下方式开展语域分析;Biber(1988)则结合大规模语料和数据降维方法,自下而上自动析取语域维度。本研究遵循后一种研究路径,通过数百个与语域相关的词汇语法特征,自动归并出语篇功能维度。我们认为语域与众多语言特征之间互为表里,是一种概率性的共选关系(许家金 2014, 2020b)。

不少汉语研究文献触及语域和语法的关系(如吕叔湘 1992; 陶红印 1999; 张伯江 2007等),但语域研究尚未成为汉语学界的核心议题。然而,语体制约语法,语法构建语体(施春宏 2019)的观念近年逐步受到重视,特别是冯胜利(2003)“语体语法”的提出,使得汉语语域研究备受关注。

冯胜利(2003)指出现代汉语语法既有别于文言,也不同于“口语变体”,有其自身独特的遣词造句规则和韵律特征。语域是一个连续统,非正式和正式语域居于两端。五四运动以前,汉语的正式语域是文言,而非正式语域只能通过白话小说、曲艺材料和少量录音材料了解。五四运动后文言作为一种优势汉语变体逐渐弱化,现代汉语需要全新的正式语体补缺。

现代汉语语域的语料库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首先是不同子语域的对比。例如,刘艳春和王小帆(2018)曾利用Biber提出的多维分析法对小说和传记中的63项语言特征进行对比,发现这两种语域在上下文、互动性和情感特征等功能维度差异明显。刘艳春和赵艺(2018)曾对比专门科技和通俗科技语域的差异。第二个方面是现代汉语的语域特征地域对比。吴东英和许谦文(2000)比较了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地区汉语新闻语域的差异。再有,邹嘉彦和莫宇航(2013)对汉语在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书面语的演变进行了考察。第三方面,翻译汉语也是汉语书面语语域研究的热点之一。胡显耀(2010)研究发现多维分析法可有效揭示原创汉语和翻译汉语的差异。秦洪武和夏云(2017)考察了原创汉语和翻译汉语中词性的历时变化。最后一方面是有关汉语语域的综合研究。刘艳春(2019)选取72项语言特征,对17个汉语细分语域进行深度考察,找出了“情感态度与逻辑关系或时间序列”“复杂与简单语法结构”与“个体行为与抽象概念”等汉语语域独有维度。张正生(2013)利用对应分析探究了书面语的正式程度与文言成分比重之间的关系。张正生认为,“书口”(书面语和口语)对立不足以解释汉语语域的变异特点,还需与“文白”(文言和白话)对立维度相结合。崔希亮(2020)则分别从语法和语用层面考察了正式语体和非正式语体之间的差异。

概言之,文献中不乏对现代汉语字词、句式的历时考察,然而对篇章综合特征的百年嬗变关注不多(许家金 2020a)。本研究则以历时视角,试图揭示现代汉语语域的演变规律,简言之,现代汉语在语篇功能维度何以发展成如今的面貌。

### 3. 研究设计

#### 3.1 研究问题

本研究基于近百年间的现代汉语历时书面语语料库,对五个历史时期的现代汉语分别进行因子分析,尝试回答以下问题:

过去一百年间,不同时期现代汉语各语域呈现哪些语篇功能?它们揭示出怎样的语域演变态势?

#### 3.2 语料库

本研究采用的历时语料库将现代汉语分为五个时段(见表1),是在秦洪武和夏云(2017)所用库基础上扩充约400万字建成,语料库总规模为5,767,929词(合10,138,846字)。第一时期是现代汉语的前发展时期(刁晏斌2006:25)。虽然一般将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视为现代汉语的起点,但现代汉语新语域的形成必然有其酝酿过程。因此,我们纳入20世纪初现代汉语语料,将1911年作为第一个时段的下限。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有识之士开始追求语域革新。封建时期的表达方式,如“公车上书”开始让位于面向公众的报刊杂志(李春阳2017:9)。1919年至1930年间,是现代汉语初步形成期。五四运动正式确立了现代白话文在汉语书面语中的正统地位。然而,白话文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伴随着文言与白话之争。现代汉语在曲折中继续发展,一系列有关文法革新的讨论持续展开。1949年后的十余年,现代汉语逐步走向成熟。社会制度的改变和大规模的语言文字规范运动使得现代汉语迎来全新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新的表达方式大量涌现,现代汉语语域也随之发展。语料库中前四个时期中文学和非文学文本分别占40%和60%左右,改革开放后文学和非文学文本比例为各50%左右。

表1 现代汉语历时语料库的构成与分期

| 语料库分期     | 时段        | 库容(词)     |
|-----------|-----------|-----------|
| 现代汉语前发展期  | 1900-1911 | 992,921   |
| 现代汉语初步形成期 | 1919-1930 | 1,018,500 |
| 现代汉语变革期   | 1931-1949 | 1,006,315 |
| 现代汉语走向成熟期 | 1950-1966 | 965,619   |
| 现代汉语的新发展期 | 1978-2012 | 1,784,574 |
| 总计        |           | 5,767,929 |

#### 3.3 词汇语法特征的选取

本研究中使用到的语言特征分为三大类:语域相关的典型语法特征、具有语域区分度的逻辑关联成分和表时间的关联成分(见表2)。本研究在选取现代汉语语域相关词汇语法特征时,遵循以下原则。首先,词汇语法特征的确定考虑到全部五个时期,而非其中个别时期。例如,第一人称代词这个类别下既包括文言代词“吾、余、予”,也收录当前汉语中更常用的“我”。其次,所选取的词汇语法特征应尽可能适合语料库检索。限于篇幅,文中无法给出587个具体的词汇语法形式。

本研究尽可能涵盖现有文献中的重要检索词。为保证测量特征矩阵的信度,我们利用选取的语言特征和时段构建矩阵,计算所得科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 )为0.91,达到高取

信范围。可见本研究选取的检索特征可以较好满足现代汉语历时语域研究的需要。

表2 语言特征

| 语言特征大类 | 语言特征次类                                     |
|--------|--|
| 典型语法特征 | 体标记、代词、动词、结构助词、语气助词、模糊语和强化语、否定、疑问句、比较句     |
| 逻辑关联成分 | 逻辑连接词、话题标记、巧合类标记、换言标记、对立和对比、推论标记、总结标记、举例标记 |
| 时间关联成分 | 先时标记、后时标记、共时和泛时标记                          |

### 3.4 研究方法

本研究利用梁茂成和熊文新 (2008) 开发的 wxPatCount 软件, 基于正则表达式检索得出各时期所有词汇语法特征的出现频次。例如, 经历体的检索表达式包含“\S+\_v\s 过”, 表示动词后添加“过”的情况。统计数据通过因子分析加以降维, 将大量语言特征归集为不同篇章功能维度。因此, 整个研究采用自下而上的归纳论证 (见图 1), 即以 500 多万词 (约 1,000 万字) 的历时现代汉语语料为基础, 依赖 20 大类、45 小类, 共 587 个能够区分语域的词汇语法特征, 归并出若干篇章功能维度。据此, 我们尝试探讨不同时期现代汉语的语域变异。



图1 自下而上的语域分析流程

## 4. 结果和讨论

### 4.1 现代汉语语域的整体演变趋势

表3展示了各时期现代汉语语域维度因子分析结果和不同篇章功能维度的词汇语法特征。总体上, 现代汉语篇章功能维度不断明晰化。表3显示现代汉语的叙事模式在“夹叙夹议”基础上增加了叙事性和互动性功能维度。五四运动后, 书面语变得更加平实, 书面语和口语词汇交叠使用。大量口语词汇融入书面语中。互动性作为典型的口语特征, 也成了书面语的重要功能维度。近百年英语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口语化趋势 (Leech et al. 2009: 239)。现代汉语的论说模式更明确地表现为晓之以理 (logos)、动之以情 (pathos) 和道之以信 (ethos) 三类, 具体判断时以因子分析中各因子中载荷最高的相关语言特征综合得出。譬如, 晓之以理型论说, 指的是通过逻辑进行论说, 多以假设、条件等词汇语法特征来体现; 动之以情型论说旨在以引起读者共鸣的方式进行论说, 多以劝导型动词、能愿动词为典型特征; 道之以信型论说是增强可信度的论说方式, 以言据标记等为代表。综论型论说是涵盖引论、本论、结论等几方面的综合型维度, 也可称为“论说性”特征。引论部分的特征由话题标记、巧

合类标记、主观态度类动词等语言特征组成。本论部分涉及不同类型的论述方式。结论部分通过总结标记等语言特征对话题进行概括。行文中为分述综论和相关子类,特加“综论型”以区分。叙事特征包括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和抒情三个层面。论说特征还将根据行文中的引论、本论和结论进行分类。以下将对各时期现代汉语篇章维度进行总结。

表3 各时期现代汉语语域维度因子分析结果汇总

| 时段        | 语域维度 |         |         |
|-----------|------|---------|---------|
| 1900-1911 | 夹叙夹议 | 晓之以理型论说 | 综论型论说   |
| 1919-1930 | 夹叙夹议 | 综论型论说   | 晓之以理型论说 |
| 1931-1949 | 夹叙夹议 |         | 道之以信型论说 |
| 1950-1966 | 夹叙夹议 | 互动性     | 动之以情型论说 |
| 1978-2012 | 互动性  | 综论型论说   | 叙事性     |

4.2 不同时期现代汉语语域演变趋势

4.2.1 1900-1911年间现代汉语篇章功能维度

1900至1911年的现代汉语因子分析主要得到了三个功能维度:夹叙夹议、晓之以理型论说和综论型论说。表4展示了1900至1911年这一时期三个篇章维度下的语言特征(特征后的括号中的数值为因子载荷)。

表4 1900-1911篇章功能及对应的语言特征

| 篇章维度    |    |      | 语言特征和因子载荷   |
|---------|----|------|---|
| 夹叙夹议    | 叙事 | 叙事视角 | 第一人称代词 (0.998)、指示代词 (0.997)、第二人称代词 (0.990)、疑问代词 (0.971)、第三人称代词 (0.956)、不确指代词 (0.912)  |
|         |    | 叙事时间 | 进行体 (0.993)、完成体 (0.977)、持续体 (0.972)、经历体 (完成) (0.961)、经历体 (未完成) (0.922)  |
|         |    | 抒情   | 语气助词表疑问 (0.995)、语气助词表肯定 (0.994)、模糊语 (0.991)   |
| 晓之以理型论说 | 议论 | /    | 转折 (0.990)、私有动词 (0.984)、递进 (0.983)、能愿动词表估价 (0.966)、能愿动词表意愿 (0.946)、劝导性动词 (0.925)、因果 (0.912)、让步 (0.911)、目的 (0.895)、能愿动词表可能 (0.808) |
|         |    |      | 公共动词 (0.959)、强化语 (0.935)、假设 (0.928)、选择 (0.921)、句首语气词 (0.912)、能愿动词表必要 (0.848)、条件 (0.673)   |
|         |    |      | 并列 (0.418)  |
| 综论型论说   | 引论 |      | 话题标记 (0.760)  |
|         | 本论 |      | 巧合类标记 (0.502)、换言标记 (0.347)  |
|         | 结论 |      | 总结标记 (0.757)、推论标记 (0.680)   |

辛亥革命前后,一些得风气之先的人士希望对汉语书面语进行全面改革,一场语域革新自此兴起。该时段第一个维度中叙事特征和论说特征混合出现,因此我们把这一维度命名为“夹叙夹议”。叙事特征可分为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和抒情。叙事视角下的特征因子载荷全部大于0.9,主要包含第一人称代词、第二人称代词、第三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疑问代词和不确指代词。中国传统小说的发展经历了从全知叙事到第一人称叙事,再到第三人称限制



叙事的过渡(陈平原 2010: 81)。全知视角下,作者凌驾于整个故事之上。全知全能的说书人洞悉一切,随时评价故事中人物的言谈举止和思想。“看官”和“诸公可知”(如例1、例2)是叙述人侵入文本的方式。陈平原(2010: 10)对1902至1909年间小说的叙事视角进行了抽样统计,发现全知叙事和第一人称叙事小说的比例占到了小说总数量的90%以上,而第三人称限制叙事小说数量仅占不到10%。叙事时间类别下的特征因子载荷均大于0.8,主要涵盖时间标记和体标记。我国旧式小说基本采取连贯叙事,域外侦探小说的引入打破了传统小说的线性直叙。新小说家开始采用倒叙和插叙,构造莫测的情节以吸引读者(陈平原 2019: 245)。抒情类别下的语言特征包括表达疑问、感叹和肯定的语气助词,与叙事和论说特征相互交织。

(1) 看官,这并非是在下扯谎,因为在下看见江南通志(是一部书的名,这书内统统说的都是江南故事),说木兰是四月初八生的,所以在下才敢这样说,闲话休提,言归正传。

(1900-1911 文学部分《木兰》)

(2) 诸公可知这颜轺回是什么人物?

(1900-1911 文学部分《文明小史》)

1911年以前这一时段,现代汉语的第二个篇章功能维度是晓之以理型论说。表4中的假设、选择、条件和并列连接词呈现了句子中的逻辑关系,公共动词、强化语、句首语气词和表必要的能愿动词表达了作者的观点态度。这一时期的论说文旨在传播域外文明,开启民智,以逻辑阐明事理,文中论述环环相扣(如例3)。

(3) 认得字的人,既然少,通文理的人还要更少,所以不要说现在没有好报没有好书,就是有惊天动地空前绝后的书报,一时销数总不能骤达一万以外,这是风气难开的缘故头一层于新党之虚假,无论所抱的什么宗旨,断没有说风气不必开的,但他所办的事,往往共他的宗旨反对,譬如那做报的文章太高深,教人看不懂,可不是共做报的初意不对么?

(1900-1911 非文学部分《论开风气的法子》)

第三个维度综论型论说是在中外文化碰撞的年代表达立场的重要尝试。这一时期的论说文逐渐突破八股格式,为后期语域革新做了铺垫。例如,梁启超的“新民体”介于文白之间,平易清晰,笔锋常带情感又长于论辩,宣传改良的同时启迪民智,为后期白话文运动之先河。

#### 4.2.2 1919-1930年间现代汉语篇章功能维度

1919至1930年汉语的语域维度与前一个阶段相同,但话语功能次序略有变化:夹叙夹议、综论型论说和晓之以理型论说(见表5)。

表5 1919-1930篇章功能及对应的语言特征

| 篇章维度 |    |      | 语言特征和因子载荷  |
|------|----|------|--|
| 夹叙夹议 | 叙事 | 叙事视角 | 疑问代词(0.993)、第一人称代词(0.980)、第三人称代词(0.973)、指示代词(0.961)、第二人称代词(0.937)          |
|      |    | 叙事时间 | 进行体(0.989)、完成体(0.984)、经历体(完成)(0.981)、变化体(0.977)、持续体(0.972)、经历体(未完成)(0.922) |

续表5

| 篇章维度    |    |   | 语言特征和因子载荷   |
|---------|----|---|---|
| 综论型论说   | 抒情 |   | 模糊语 (0.994)、语气助词表肯定(0.989)、语气助词表疑问 (0.977)、句首语气词 (0.784)  |
|         | 议论 | / | 私有动词 (0.993)、能愿动词表意愿 (0.985)、能愿动词表必要 (0.982)、能愿动词表可能 (0.976)、转折 (0.976)、断言立场类动词 (0.943)、递进 (0.929)、让步 (0.907)、能愿动词表估价 (0.901)、因果 (0.880)、目的 (0.857) |
|         | 引论 |   | 话题标记 (0.940)  |
|         | 本论 |   | 否定句 (0.989)、比较 (0.988)、先时标记 (0.983)、共时和泛时标记 (0.971)、后时标记 (0.960)、巧合类标记 (0.958)、换言标记 (0.942)、反义疑问句和选择问句 (0.917)、举例标记 (0.881)                         |
|         | 结论 |   | 推论标记 (0.982)、总结标记 (0.977)   |
| 晓之以理型论说 |    |   | 假设 (0.897)、公共动词 (0.861)、选择 (0.857)、语气助词表感叹 (0.837)、条件 (0.770)、并列 (0.686)、对立和对比 (0.404)  |

这一时期的叙事模式继续由全知叙事向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限制叙事过渡。截至20世纪30年代,第三人称限制叙事取代了第一人称叙事,成为中国现代小说中主要叙事模式(陈平原 2010: 81)。随着大量日记体和书信体小说进入中国,“五四”时期的作家逐步尝试以第一人称叙事和第三人称限制叙事的方法,将全新的叙事视角引入中国小说创作中。同样,域外小说也是五四时期作家交错叙事的样板,他们打破原有叙事模式,对不同的叙事元素进行重新组合。

白话文运动使得这一时期的论说文更加明白晓畅,富有逻辑,与不宜说理的古文大相径庭(李春阳 2017: 37)。与文言相比,白话在“绘影绘声”上具有独特的优势,使读者不仅能够了解文章的意思,也能体会到文章中人物的身心状态(张中行 2007: 211)。这一时期的论说文对社会价值的塑造和启蒙起到了重要作用。

#### 4.2.3 1931-1949年间现代汉语篇章功能

战争时期的现代汉语主要包含两个维度。一个是夹叙夹议,另一个维度是道之以信型论说。表6展示了两个篇章维度下的语言特征和因子载荷。

表6 1931-1949篇章功能及对应的语言特征

| 篇章维度 |    |      | 语言特征和因子载荷  |
|------|----|------|--|
| 夹叙夹议 | 叙事 | 叙事视角 | 疑问代词 (0.993)、第三人称代词 (0.988)、第一人称代词 (0.985)、第二人称代词 (0.978)、不确指代词 (0.969)、指示代词 (0.921)                 |
|      |    | 叙事时间 | 先时标记 (0.997)、后时标记 (0.994)、变化体 (0.993)、进行体 (0.992)、共时和泛时标记 (0.989)、经历体 (完成) (0.981)、经历体 (未完成) (0.974) |
|      |    | 抒情   | 模糊语 (0.998)、强化语 (0.995)、语气助词表疑问 (0.986)、句首语气词 (0.969)  |

续表6

| 篇章维度    | 语言特征和因子载荷   |
|---------|---|
| 议论 /    | 私有动词 (0.997)、否定句 (0.997)、比较 (0.996)、推论标记 (0.996)、反义疑问句和选择问句 (0.994)、总结标记 (0.992)、能愿动词表必要 (0.992)、条件 (0.992)、能愿动词表意愿 (0.992)、语气助词表肯定 (0.992)、递进 (0.992)、并列 (0.989)、能愿动词表可能 (0.986)、目的 (0.975)、转折 (0.974)、公共动词 (0.972)、能愿动词表估价 (0.971)、换言标记 (0.951)、巧合类标记 (0.949)、断言立场类动词 (0.948)、让步 (0.947)、话题标记 (0.947)、选择 (0.935)、假设 (0.924) |
| 道之以信型论说 | 举例标记 (0.897)、语气助词表感叹 (0.772)、对立和对比 (0.716)  |

夹叙夹议的篇章维度在语域上有别于前两个时期,这一时期最热门的是报告文学和通讯。各种面向大众的抗战故事和壁报文学与抗战时期的宣传紧密配合,作家的创作紧贴“救亡”的主题(钱理群等 1998: 383)。这一时期的道之以信型论说多使用例证(如例4)、事物对比(如例5)和换言阐述(如例6)的方式来增加论说可信度。

(4) 经常要采取巧妙的方法,去欺骗、引诱和迷惑敌人,例如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即打即离、夜间行动等。

(1931-1949非文学部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5) 不平等条约对中国国民心理的影响,是与政治经济军事的影响一样的创巨痛深。

(1931-1949非文学部分《中国之命运》)

(6) 然此项外资之借入,宜自行利用,不假外人之手,藉免引狼入室,自作陷阱,失却国家之主权。换言之,外资之投入宜为间接投资,而非直接投资。

(1931-1949非文学部分《中国新工业之回顾与前瞻》)

#### 4.2.4 1950-1966年间现代汉语篇章功能维度

1949年以后的现代汉语主要包含三个篇章功能维度:夹叙夹议、互动性和动之以情型论说。三个篇章维度下的语言特征和因子载荷见表7。

表7 1950-1966篇章功能及对应的语言特征

| 篇章维度               | 语言特征和因子载荷  |
|--------------------|--|
| 夹叙夹议    叙事    叙事视角 | 第三人称代词 (0.924)   |
| 叙事时间               | 后时标记 (0.914)、先时标记 (0.910)、变化体 (0.901)、共时和泛时标记 (0.898)、进行体 (0.771)、经历体 (完成) (0.601)、经历体 (未完成) (0.324)   |
| 抒情                 | 模糊语 (0.998)、增强语 (0.995)、语气助词表疑问 (0.986)、句首语气词 (0.969)  |
| 议论 /               | 转折 (0.931)、私有动词 (0.929)、比较 (0.867)、推论标记 (0.856)、换言标记 (0.826)、总结标记 (0.823)、并列 (0.818)、巧合类标记 (0.790)、话题标记 (0.776)、选择 (0.755)、让步 (0.749)、举例标记 (0.563) |



续表7

| 篇章维度    | 语言特征和因子载荷  |
|---------|--|
| 互动性     | 疑问代词 (0.950)、否定句 (0.949)、指示代词 (0.937)、第二人称代词 (0.918)、语气助词表肯定 (0.896)、条件 (0.896)、第一人称代词 (0.881)、反义疑问句和选择问句 (0.872)、假设 (0.867)、能愿动词表意愿 (0.862)、语气助词表感叹 (0.845) |
| 动之以情型论说 | 能愿动词表可能 (0.900)、不确指代词 (0.844)、因果 (0.817)、能愿动词表必要 (0.793)、完成体 (0.790)、递进 (0.732)、目的 (0.681)、能愿动词表估价 (0.603)、对立和对比 (0.478)                                     |

不同于前两个时期,这一时期的叙述中互动元素增多(如例7)。人称代词、疑问代词和指示代词是互动中的主体;语气助词是互动中的情感表达;假设、条件、能愿动词表意愿、私有动词和模糊语则体现了互动双方询问对方意见和表达自己观点态度的过程。这些特征原本多见于口语对话,却较多出现在书面语当中。这是因为口语和书面语并非截然对立(Chafe 1982; Crystal & Davy 1969: 70),而是个连续统。口语可以带有书面语特征(例如,新闻联播和政府工作报告),书面语中也可以涵盖口语特征(例如小说和广告)。书面语中的口语化风格体现了双向交际,以通俗、亲切的表达拉近作者和读者间的交际距离。英文语篇的历时变化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口语化趋势。例如,Biber和Finegan(1989)发现,小说、散文和书信口语化的趋势愈发明显。这三种文体的互动性增强,结构变得更加简单,描述的事物由抽象变得具体。

(7) 我总想不通: 凭什么姑母,一位寡妇,而且是爱用烟锅子敲我的脑袋的寡妇,应当吃几份儿饷银呢?

(1950-1966文学部分《正红旗下》)

1950-1966年间另一个重要的维度是动之以情型论说。这种论说模式强调情感在论说中的作用。

(8) 全国科学工作者、全国各种科学机构和全国各级科学事业的机关,应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比先进,比成绩。只要科学界和技术界努力奋斗,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提前实现的可能是完全存在的。我们应当乘风破浪,奋勇前进。

(1950-1966非文学部分《科学事业》)

1900年至1949年前,由于文言的滞留效应,白话仍处于“蹒跚学步”的阶段,现代汉语“芜杂不精”。现代汉语写作“无法可依”,所以常常出现“四不像的白话文”(刁晏斌 2006: 18-21)。1949年后,在党和国家领导下推出了一系列语言文字规范化举措。例如1949年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1951年吕叔湘、朱德熙合著《语法修辞讲话》,1953年《新华字典》出版等。再者,许多学者自幼受文言训练,在白话创作方面并不能做到得心应手,写作中感性发挥的成分多于对白话文法的理性遵守,而新语法修辞规范的确立使得现代汉语的篇章功能逐步稳定下来。

## 4.2.5 1978-2012年间现代汉语篇章功能维度

表8 1978-2012篇章功能及对应的语言特征

| 篇章维度  |    | 语言特征和因子载荷   |
|-------|----|---|
| 互动性   |    | 疑问代词 (0.804)、语气助词表疑问 (0.751)、第二人称代词 (0.674)、否定句 (0.671)、第一人称代词 (0.658)、私有动词 (0.656)、第三人称代词 (0.606)、指示代词 (0.470)、反义疑问句和选择问句 (0.466)、语气助词表感叹 (0.465)、条件 (0.457)、模糊语 (0.449)、能愿动词表意愿 (0.340) |
|       |    |   |
| 综论型论说 | 引论 | 话题标记 (0.355)  |
|       | 本论 | 能愿动词表可能 (0.628)、因果 (0.612)、递进 (0.602)、不确指代词 (0.469)、让步 (0.459)、举例标记 (0.442)、换言标记 (0.413)、能愿动词表估价 (0.314)  |
|       | 结论 | 增强语 (0.346)   |
| 叙事性   |    | 完成体 (0.774)、语气助词表肯定 (0.746)、假设 (0.668)、变化体 (0.547)、先时标记 (0.518)、共时和泛时标记 (0.489)、进行体 (0.454)、经历体 (完成)(0.418)   |
|       |    |   |

1978至2012年现代汉语的语域维度为互动性、综论型论说和叙事性(见表8)。与前几个时期相比,并没有出现新的语域维度。这是由于建国后现代汉语的语法体系和篇章功能已基本稳定,这一时期的语言变化主要体现在词汇层面。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现代汉语的语言形式受英语的影响,变得更加丰富多样。例如,受翻译汉语的影响,现代汉语当中出现了较多新词缀,包括前缀“非”“反”和后缀“性”“化”“主义”等(郭鸿杰 2002)。同时,大量字母词也开始进入现代汉语中(刘涌泉 1994, 2002; 朱一凡 2018)。这些语言特征虽然对现代汉语的发展至关重要,但对篇章功能的影响较有限。

## 5. 结论

本研究对照20世纪历史变迁,将现代汉语归为五个时期,考察了现代汉语语域的历时演变。我们得出以下结论,百年来现代汉语总体呈现三大语域特征:第一、篇章功能明晰化,即从“叙、论共生”到“叙、论分立”。例如,1978年之后的语料显示,互动性、论说性和叙事性成为相对稳定的自足功能维度;第二、交际距离趋近化。从1950年开始,互动性在篇章功能维度中的位次逐步提升。1978年之后,互动性成为现代汉语的最重要的功能维度。互动元素的增多拉近了读者与作者的距离,使文本更加通俗平易。第三,现代汉语篇章功能还表现出明显的历史时期关联性:(1) 1900年到1966年的大半个世纪内,夹叙夹议始终是主流语域特征;(2) 20世纪前30年晓之以理型论说是一个重要语域特征;(3) 1949年到1966年前后,动之以情型论说较为突显;(4) 叙事语篇内部也发生了变化:叙事视角由“全知全能”的说书人型视角逐步向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限制叙事过渡,叙事中也融入更多倒叙、插叙等手法。对照Biber (1988)有关英语的语域研究,汉英语域演变过程中均存在“交互性”“叙述性”和“论说性”几个功能维度。然而,汉语语域演变细化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和“道之以信”三个议论分支。此外,汉语语域由“叙、论共生”向“叙、论分立”转变。现代汉语语域的演变进程,既有传统语域的留存,也有域外文风的移植。现代汉语语域的“古语今言”“化西为中”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和辨识。

## 参考文献:

- [1]Biber, D. 1988. *Variation Across Speech and Writing*[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Biber, D. & E. Finegan. 1989. Drift and the evolution of English style: A history of three genres[J]. *Language*, (3): 487-517.
- [3]Biber, D. & S. Conrad. 2009. *Register, Genre, and Styl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4]Chafe, W. 1982. Integration and involvement in speaking, writing, and oral literature[A]. In D. Tannen (ed.).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Exploring Orality and Literacy*[C]. Norwood: Ablex.
- [5]Crystal, D. & D. Davy. 1969. *Investigating English Style*[M]. London: Routledge.
- [6]Halliday, M. 1978.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M]. London: Edward Arnold.
- [7]Leech, G., M. Hundt, C. Mair & N. Smith. 2009. *Change in Contemporary English: A Grammatical Stud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8]陈平原. 2010.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9]陈平原. 2019. 中国小说小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0]陈平原. 2020. 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1]崔希亮. 2020. 正式语体和非正式语体的分野[J]. 汉语学报, (2): 16-27.
- [12]刁晏斌. 2006. 现代汉语史[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 [13]冯胜利. 2003. 书面语语法及教学的相对独立性[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 53-63.
- [14]冯胜利. 2018. 汉语语体语法概论[M].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15]郭鸿杰. 2002. 二十年来现代汉语中的英语借词及其对汉语语法的影响[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5): 1-4.
- [16]胡显耀. 2010. 基于语料库的汉语翻译语体特征多维分析[J]. 外语教学与研究, (6): 451-458.
- [17]李春阳. 2017. 白话文运动的危机[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18]梁茂成 熊文新. 2008. 文本分析工具 PatCount 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中的应用[J]. 外语电化教学, (5): 71-76.
- [19]梁启超. 1902.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J]. 新小说, (1): 1-8.
- [20]刘艳春 王小帆. 2018. 小说和传记语体多特征对比分析[J]. 江汉学术, (1): 120-128.
- [21]刘艳春 赵艺. 2018. 专门科技语体和通俗科技语体多特征对比研究[J]. 江汉学术, (3): 113-122.
- [22]刘艳春. 2019. 汉语语体变异的多维度分析——基于 17 个语体 72 项语言特征的考察[J]. 江汉学术, (3): 100-110.
- [23]刘涌泉. 1994. 谈谈字母词[J]. 语文建设, (10): 7-9.
- [24]刘涌泉. 2002. 关于汉语字母词的问题[J]. 语言文字应用, (1): 85-90.
- [25]吕叔湘. 1992. 文言和白话[A]. 吕叔湘编. 吕叔湘文集第四卷[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26]钱理群 温儒敏 吴福辉. 1998.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7]秦洪武 夏云. 2017. 基于历时语料的翻译与现代汉语互动研究[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28]施春宏. 2019. 语体何以作为语法[J]. 当代修辞学, (6): 1-20.
- [29]陶红印. 1999. 试论语体分类的语法学意义[J]. 当代语言学, (3): 15-24.
- [30]吴东英 许谦文. 2000. 方言变异还是语体变异? ——内地与香港娱乐新闻语篇范畴的差异分析[J]. 中国语文, (1): 35-41.
- [31]许家金. 2014. 许家金谈语料库语言学的本体与方法[J]. 语料库语言学, (2): 35-44.
- [32]许家金. 2020a. 基于语料库的历时语言研究述评[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 200-212.
- [33]许家金. 2020b. 多因素语境共选: 语料库语言学新进展[J]. 外语与外语教学, (3): 1-10, 21.
- [34]张伯江. 2007. 语体差异和语法规律[J]. 修辞学习, (2): 1-9.
- [35]张正生. 2013. 陆港台书面语近年演变比较[A]. 冯胜利编. 汉语书面语的历史与现状[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36]张中行. 2007. 文言和白话[M]. 北京: 中华书局.
- [37]周作人. 2011. 《燕草》跋[A]. 周作人编. 永日集[C]. 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
- [38]朱一凡. 2018. 基于语料库的英汉翻译对当代汉语影响的研究[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39]邹嘉彦 莫宇航. 2013. 陆港台书面语近年演变比较[A]. 冯胜利编. 汉语书面语的历史与现状[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of this study help to identify the applicability and limitation of the Appraisal System and provide new understandings of the theory in new media context.

**Keywords:** new media; Appraisal System; WeChat Liking; multimodality; interpersonal meaning

**Positioning Effects of Attitudinal Stance in News Discourse of War**, p. 56. *DONG Surong & MIAO Xingwei*

Attitudinal stance involves the evaluation of the stance object by the stance subject, i.e., the stance subject displays his or her attitude(s) towards the object by means of expressing value judgments and personal feelings. Previous studies have mainly focused on the categories of attitudinal stances and their explicit markers in discourse, while scant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positioning effects of attitudinal stances. Drawing on the stance triangle of Du Bois (2007) and the ideological square of van Dijk (2011), this paper propos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positioning effects for the analysis of news discourse of war. Within the framework, this study further explores how war news discourse mediates between two sides through a trinity mechanism of “evaluation-positioning-alignment” to achieve the positioning effects of constructing “enemies”, legitimizing war and aligning with readers.

**Key words:** news discourse of war; attitudinal stance; stance-taking; positioning effects

**A Metapragmatic Interpretation of “What are you/we talking about?” Construction**, p. 66. *JIANG Hui*

“What are you / we talking about?” is a frequently used idiomatic construction in verbal interaction. This idiom, which has a conventionalised construction meaning and various pragmatic meanings, tends to function as an indicator of metapragmatic awareness, monitoring and managing previous discourse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Based on the metapragmatic theory, this paper aims to reveal the speaker’s metapragmatic awareness in different contexts by analyzing the pragmatic functions of “What are you / we talking about?” in 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 It is found that speakers frequently use “What are you / we talking about?” construction to indicate their metapragmatic awareness in four dimensions of communication: text, information, the speaker and the participants. Any choice of “What are you / we talking about?” may serve such functions as managing discourse organization, providing cognitive-interpretive framework for the audience, constructing authoritative identity, and managing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he findings can offer some insights for further construction research, and the metapragmatic interpretation of construction helps us infer and interpret speaker’s communicative intention comprehensively.

**Key words:** metapragmatics; “What are you / we talking about?” construction; metapragmatic awareness

**A Study of Register Change in Written Chinese Over the Last Century**, p. 76. *XU Jiajin & LI Jiale*

Modern Chinese changes over time, be it fast or slow, microscopic or macroscopic. Many previous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have focused on the diachronic change of words and sentence patterns, but little has been done on the evolution of discourse features over the last 100

year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register change of modern written Chinese over the past century using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gister change of written modern Chinese can be understood in three overarching orientations: 1) differentiation of discourse functions, namely, a transition from intermingled narration-argumentation to separated narration and argumentation. For instance, the post-1978 era sees interaction, argumentation, and narration as relatively stable autonomous discourse functions; 2) proximization of communicative distance. Interactivity has gradually gained prominence in register-related discourse functions since 1950. since 1978, interactivity has stood out as the primary discourse function among others in written modern Chinese. This draws writers and readers closer and renders more readable texts; 3) the discourse functions of modern Chinese registers have strong associations with given historical periods, such as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changes of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Chinese modern history. Essentially, multiple factor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register change of modern written Chinese, such as the preserv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and the impact of foreign languages.

**Key words:** modern written Chinese; discourse functions; register change; register grammar; corpus

**A Study of Evolutional Features of Modern Chinese: Structural Complexity**, p. 87. *QIN Hongwu, ZHOU Xia & KONG Lei*

Using a corpus of historical vernacular Chinese as data, this study presents a diachronic investigation into the macroscopic changes of modern Chinese in structural complexity (SC) over the past century. Specifically, the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achronic changes of SC and sentence segment length (SSL) and assesses SC changes and their motivating factors by using colligation and dependency distance measures. The study yields the following four findings. 1) Over the past century, SC in Chinese has exhibited an overall increase, with its increase occurring most noticeably during the 1920s and 1930s; 2) Changes in SC have varied across genres, with a small change found in literary texts, while greatest change observed in academic texts; 3) Parallel to changes in SC, similar change patterns have occurred with SSL, with the SSL changes being a strong predictor of those of SC; 4) The diachronic analysis of colligations shows that colligations containing adverbs can form sentence segments with a lower complexity, which are used mostly as discourse markers in literary texts, while colligations containing the particle “de” (的) are found mostly in incomplete expressions used to form complex structures in academic texts; 5) SC measured by dependency distance has also displayed a diachronic increase, with the greatest increase also found in academic texts.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while it is logical to study changes in modern Chinese by examining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s as a dichotomy, a genre-based account of change may enable us to present a systematic description of the variations in the extent of SC changes across genres. As have been shown in this study, SC changes in modern Chinese have exhibited the following hierarchical pattern: academic writings > general texts > news > novels.